

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

北京大學出版社



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

主 編：劉 堅

撰 稿：唐作藩 耿振生 何九盈 裘錫圭
沈 培 李佐丰 蔣冀騁 徐通鏘
陳保亞 王理嘉 晁繼周 馬慶株
項開喜 王福堂 宗廷虎 吳禮權
傅永和 呂必松 孫宏開 石安石
林茂燦 沈家煊 馮志偉 陳章太

策 劃：郭 力

北京大學出版社

北 京

DXD/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刘坚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6

ISBN 7-301-03788-0

I. 二… II. 刘… III. 语言学-中国 IV. HO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2560 号

书 名: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责 任 者: 刘坚 主编

责 任 编 辑: 胡双宝、郭力

标 准 书 号: ISBN 7-301-03788-0/H · 398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 印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7.25 印张 700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一版 1998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说 明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是上个世纪中国语文学的继续和发展，是上个世纪末中国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产物。

十九世纪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其结果是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以内忧外患为主要特点的中国近代史从此开始。严酷的现实促使一批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觉醒起来。他们处在国家兴亡的关头，采用西方的进步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希望能找到一条富国强兵的道路。在要求政治改革的同时，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士也感到，文言作为书面语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表达思想的需要，从而要求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白话来取代文言。从晚清到民初，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不断扩大，直到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真正动摇了文言的正统地位，白话开始成为百年来中国的正式书面语言。

中国传统的语文学——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在“五四”前后受到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同时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这两大潮流汇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百年来的中国语言学。

当此世纪之交，总结中国语言学一百年来的发展的时候，恰逢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编纂出版《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这本书，又多了一重意义。

本书由我们约请各个学科领域里的专家分工撰写。各部分字数多寡不一，行文风格也不尽一致，内容也可能偶有重复之处，我

们除了技术性的改动以外，不作内容上的增删。作者们的观点，更不妄加更动。某些术语、译名，因多与各作者以往的论著一致，我们也不加统一。约稿要求中曾说及评述研究状况应包括撰稿人的研究成果，部分作者出于不同考虑而未论及。至于述及古今学者一律直称名讳不加“先生”等字眼，则属事先约定事项，特加说明。

全书排列的顺序是先传统学科，后新兴学科，以便大致显现一百年来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脉络。

论述中凡《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以外的字，径用繁体，而不另造新的简体。

我们缺乏编写这样一本专书的经验，错误不当之处应由我们负责，尚请专家和读者教正。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编辑小组

刘 坚 胡双宝 郭 力

目 录

壹	二十世纪的汉语音韵学	唐作藩 耿振生 (1)
貳	二十世纪的汉语训诂学	何九盈 (53)
叁	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字学	裘锡圭 沈 培 (91)
肆	二十世纪的古汉语语法学	李佐丰 (139)
伍	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	蒋冀骋 (182)
陆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语言学 ...	徐通锵 陈保亚 (225)
柒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音学和语音研究	王理嘉 (295)
捌	二十世纪的现代汉语词汇学	晁继周 (378)
玖	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语法学 ...	马庆株 项开喜 (449)
拾	二十世纪的汉语方言学	王福堂 (507)
拾壹	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	宗廷虎 吴礼权 (537)
拾貳	二十世纪的汉语言文字规范工作	傅永和 (583)
拾叁	二十世纪的对外汉语教学	吕必松 (613)
	——学科地位的确立和学科理论研究	
拾肆	二十世纪中国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研究	孙宏开 (641)
拾伍	二十世纪的中国普通语言学	石安石 (683)
拾陆	二十世纪的汉语语音的 描写实验和解释	林茂灿 (712)
拾柒	二十世纪的中国话语语言学	沈家煊 (743)
拾捌	二十世纪的中国数理语言学	冯志伟 (775)
拾玖	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语言学	陈章太 (821)

壹 二十世纪的汉语音韵学

唐作藩 耿振生

一、 前 言

汉语音韵学是一门有悠久历史的学科。在二十世纪初叶以前，它属于我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科——小学中的一个重要部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这门学科走上了中西结合的道路，在继承丰厚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番更新改造，吸收了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引进、发展了新的方法，拓宽了研究道路，大大丰富了它的内容，获得了新的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本世纪汉语语言学中最有生气、最为繁荣的学科之一。

传统音韵学起源于东汉末年，它的建立以反切的出现为标志。发明反切，标志着古人已经能够分析出声母、韵母等音节内部分，这意味着他们的审音能力达到了一定的精密程度，从此以后，语音的研究就成为一个专门的学问。从东汉到清末，传统音韵学经过了一千七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语音研究路子，在世界语言学史中占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地位。

跟传统音韵学相对，二十世纪的汉语音韵学被称为现代音韵学。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西学东渐成为一时大潮，音韵学这门古老学科也和其他许多人文学科一样走向现代化，它通过吸收

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而导致具有根本意义的转变，成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或者说具有标志意义的有这样几点：第一，理论和观念的转变；第二，研究方法的改进和创新；第三，材料的补充和多样化、研究领域的拓宽；第四，科学性的提高和实用性的转变与加强。

观念和指导理论是一门学科的基础，这方面的变化使现代音韵学跟传统音韵学有了重大区别。从总体上看，传统音韵学的实用色彩是非常鲜明的，它的目标不外乎“正音”、“通经”、“发蒙”三个方向。正音即力图制定出一种可以作为规范的语音系统让人们遵守；通经即把古音研究的成果运用到训诂当中以准确理解经书和其他古籍；发蒙即用反切、韵图等方法让人们认识生字的读音。虽然明清时代也有音韵学家认识到语音的历史变迁，但他们的具体研究总是断代的而非历时的。这就把音韵学限定在语文学的范畴内，成为经学的附庸。现代音韵学从观念上不把语音研究看作是为读经服务的，而是语言学研究的一部分，是语言史的一个方面：它借鉴了西方的历史语言学理论作为指导理论，并在中国的土地上有所发展提高，主要是全面建立并运用了语言发展的历史观点，注重从语音演变的规律性去解释各个时代的语音现象，强调各个时代语音平面的动态演变及由此而生的内在联系，以及考察各方言之间语音异同所反映的历史来源上的关系，把语文学的研究变成语言学的研究。传统音韵学虽然在分析字音成分上达到了相当精密的程度，能够分析出声母、韵头、韵腹、韵尾、声调等音节内部成分，但是还缺乏先进的生理学、物理学的知识和技术，未能形成完善的语音分析手段；现代音韵学以现代语音学原理为手段，能够从生理的、物理的角度把语音现象解释清楚，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上说明语音单位的形成与组合，从声波分析说明不同音素的性质，这就把从前音韵学中说不清楚的东西、玄

虚含混的东西都给解释明白了，解决了前人无法解决的问题。

现代音韵学在研究方法上比过去有了极大的进步，引进并新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研究方法。比如：（1）采用了效果良好的标音工具——国际音标，能够比较明晰、准确地区分不同的音位，比过去用代表整个音节的汉字来表示小于音节的单位的方法要科学得多。（2）引进了历史比较法、译音对勘法和内部拟测法等方法，构拟出古音的音值，同时也区别古音的音类。传统音韵学家用汉字作为记音工具，在区别音类时较为得心应手，而缺乏可靠的办法去认识古音的音值；也有一些古音学家曾经努力猜测上古音值，但在说明他们所推测的读音时则极其困难。历史比较法从现代方言和亲属语言的比较中发现古代接近实际读音的证据，译音对勘法利用不同语言之间的借词、音译词等材料来了解古代汉字读音，内部拟测法从后代语言的共时结构特征和不规则分布等现象中找到历史变化的痕迹。这些方法的运用，使了解古代实际读音的愿望得以实现，为音韵学研究开辟了宽广的道路。（3）文献考据方法也有了重大改进和创新。传统音韵学的方法基本上都属于文献考据方法，如“丝联绳引法”（韵脚字归纳法）是通过诗歌韵文的押韵来归纳出某个时代的韵部系统，“谐声字归类法”是根据谐声系列而发现上古时代的韵部和声类，“反切系联法”是通过系联反切上字而得到声类、通过系联反切下字而得到韵类，异文、通假、声训互证法是从古籍的文字使用情况以及训诂家的语源注释中发现古音线索。以上这些方法在现代音韵学中被全面继承下来并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同时现代音韵学者也创造了另外一些新的方法，例如统计学的方法、反切比较法等。统计学方法包括算术统计法、概率统计法和数理统计法等等；反切比较法是把《切韵》音系作为基本的参照系，考察其他某一部字书或音义书的反切或直音材料时，看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声类、韵类与《切韵》声类、韵类的异同。学者们在研究中常常是各种方法交互使用和互相补充。

现代音韵学的研究对象比以前大大扩充，所用材料呈现多样化趋势。传统音韵学的主要研究材料是：以《诗经》为主的先秦两汉诗歌韵文、小篆以后的谐声字、古籍中的通假异文、《切韵》—《广韵》系韵书和宋元韵图如《切韵指掌图》《四声等子》《切韵指南》等。现代音韵学仍然重视这些材料，但另外增加了大量新的研究材料，例如：古籍中的音义书、字书、注释音切、曲韵韵书、魏晋以后诗歌及词、曲的押韵等，新出土的地下文物文献如商周甲骨文、金文和战国秦汉的竹简书和帛书，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对音材料如梵汉对音、日汉对音、藏汉对音等，现代的活语言即汉语方言和汉语的亲属语言——汉藏语系各语族的语言。这些材料有的是前人没有见到过的，有的是前人虽然见到过而不曾利用的。

随着理论、方法的更新扩展和材料的丰富多样，音韵学的研究领域大大拓宽了。传统音韵学分为三个部门：研究上古音的古音学、研究《切韵》—《广韵》音系的今音学和从系统性出发分析音节结构的等韵学，有“点”和“面”的研究而没有“史”的研究，三千年历史有广大的空白，尤其是近代音，材料虽多而被轻视。现代音韵学的研究领域比起过去要全面、完备，汉语语音史学科的建立，把历史上各个阶段的语音系统和语音材料都纳入视野，研究了以前所空缺的魏晋南北朝音、唐五代音、宋代口语音、元明清的共同语语音，并以语音演变规律把各个断代音系联络起来，形成了前后贯通的语音史。除了通语以外，方音史的研究也受到重视。

汉语音韵学进入现代阶段，破除了以前的非科学的东西，就获得了真正的科学性。传统音韵学取得过巨大成就，这无疑是因为它包含正确的方法，有正确的方向；但不容否认的是传统音韵学也有十分明显的缺陷，如观念上的神秘主义，认为语音现象代表“天地万物之理”，把语音的系统性跟阴阳、五行、四象、八卦

之类生硬牵连，用一些玄虚荒诞的说法去解释声母、韵母、声调的分布规律和结合规则，这对于音韵学的进步与普及起消极的作用。现代音韵学根据普通语言学的理论，从社会性、生理机制、物理机制以及人们心理文化特点来解释语音系统的形成与变化，破除了它的神秘性，使它走上科学化的坦途。

现代音韵学的实用功能也跟以前大不相同。前文说过，传统音韵学也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但实用性是有时代特点的，在社会形态和文化结构发生了剧烈变革之后，现代音韵学的实用功能不再是正音、通经、发蒙，而是全面服务于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服务于汉语规范化，并服务于其他学科如文学、历史、考古、哲学等。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成果对于语法史、词汇史和普通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还为汉藏语系语言的历史研究提供依据或参考；中古音系统已经成为方言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工具；为更好地进行汉语的语音规范，需要从历史来源上说明普通话音系的形成和解决某些音位问题，当然也要借助于语音史知识。可以说，音韵学在现代的实用性不是削弱了而是大大加强了。

以上是根据音韵学在本世纪内总的成就、特点而概括说的。在过去的百年中，汉语音韵学并不是一直顺利发展过来的，而经历了几番曲折、几度起落，我们可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作为分界，把这段历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每个时期又各自分出三个阶段：前期的第一阶段为1922年之前，第二阶段为1923年至1937年，第三阶段自1938年至1949年；后期的第一阶段为1950年至1964年，第二阶段自1965年至1977年，第三阶段自1978年到现在。各阶段的兴衰程度、研究对象、热门课题等有明显的区别，而且都跟国家政治形势、学术环境有密切关系。下面就分别谈谈各个阶段的音韵学研究的大概情况。

二 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

——前期第一、第二阶段的汉语音韵学

从本世纪初到1937年是传统音韵学向现代音韵学转变的重要历史时代。

音韵学自身的变革改造是二十年代才掀起的，在此之前，仍然属于传统音韵学的时代，不过已经到了有千年历史的传统音韵学的最后结束的时代，而且出现了变革的前兆。当我们回顾整个二十世纪汉语音韵学的时候，是不能把这个阶段排除在外的。

从二十年代初期开始，在西方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新方法运用到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当中。首先是用梵汉对音证明古代音值的方法吹起了一阵革新之风，接着是通过介绍欧洲高本汉的历史比较法研究成果而促成了音韵学的重大转变。在音值构拟形成一时风尚的时候，古音类的重新分析也取得多方面进展，韵书的搜集整理有重要收获，十几年间创造出一个辉煌的现代音韵学。主要成绩在于音值构拟方法的引进、文献音系和音类研究的深化、《切韵》系韵书的整理出版等。

（一）第一阶段概况

第一阶段上汉语音韵学的特点是：音韵学者还是走着传统的治学之路，基本上沿用以前的方法，主要研究对象是文献中的中古音和上古音；音韵学仍然是一门玄奥学问，只有少数人才能够掌握；没有多少刊物发表文章，音韵学的知识和研究成果还主要靠讲学和著书的途径来传播，不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在这个时期，高本汉、马伯乐等西方学者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汉语古音研究，国内也有人了解到这方面的信息，但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这一时期音韵学界的代表人物是章炳麟和他的弟子黄侃、钱

玄同。章、黄被认为是清代乾嘉以来小学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他们对古音研究都有重要贡献。章炳麟在清人所分二十二韵部的基础上，又从脂部分出一个队部，定为二十三部；他主张娘、日二母上古时代归泥母，吸取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结论，又把精组合并于照组，提出了二十一声纽系统。他所分的队部是成立的，“娘日归泥”也有道理，被很多学者所肯定。黄侃把收-k 的入声韵部独立出来，重新运用戴震的阴、阳、入三分方法，定古韵为二十八部；对上古声母则采纳清人邹汉勋的一些观点，以庄组归精、章组归端，定为十九纽；对《广韵》音系，黄侃在清人陈澧所分四十声类的基础上多分出一个微母而成四十一声类，在陈澧所分三百一十一韵类的基础上加以重订而为三百三十九韵类。

钱玄同在北大讲授音韵学时，古音部分基本上采用章、黄的体系，但他是个思想活跃、追求先进的人物，并不为成说所囿。他的讲义《文字学音篇》在191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是我国近代第一部通论性音韵学教科书。书中除了介绍上古和中古的音系之外，还用了较多的篇幅讲解注音字母，另外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点是把近代音列入教学内容，指出《中原音韵》是近代北音的上源，又用了音标作为标音工具，开音韵学革新之先声。

（二）音韵学的变革——音值构拟方法的引进

1923年，胡适把北大教授、俄国籍学者钢和泰的文章《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译为中文，发表在《国学季刊》第一卷。文章认为，研究古音的音值要用三种材料：一，汉语方言读音，日本、越南、朝鲜语言的汉字读音；二，韵书的反切和韵图的分类；三，汉字与外国文字的对译读音，特别是汉、梵密咒对音。受这篇文章的启发，汪荣宝写成了《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以佛经里的音译词、日译吴音、汉音为证，推测《广韵》的歌、戈、鱼、虞、

模各韵在中古时代的读音，结论是：“唐宋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a音，不读o音；魏晋以上，凡鱼、虞、模韵之字亦皆读a音，不读u音或ü音也。”汪氏的文章在汉语学界激起了一场辩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反对者一方章炳麟等坚持传统方法，否定译音对勘法的作用。这场辩论对于古音音值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最后事实上是新派成为赢家，因为译音对勘方法广泛传播开，被很多学者接受，成了音韵学中的重要方法。这是音韵学革新的第一股动力。

推动音韵学现代化的第二股动力是对高本汉古音研究成果的介绍。高本汉是全面构拟汉语中古音和上古音的第一人。他构拟中古音的代表作是《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该书于1915—1926年陆续发表，共分四卷：第一卷“古代汉语”，第二卷“现代方言的描写语音学”，第三卷“历史上的研究”，第四卷“方音字汇”。高本汉参照等韵图，根据《广韵》的反切上字分析出它的声类，从反切下字分析出它的韵类，所分结果跟陈澧、黄侃都有出入；再把这个音系作为构拟对象，用30个汉语方言点的读音和日本译音（吴音、汉音）、高丽译音、越南译音作为比较的材料，全面地构拟出《广韵》所代表的中古声母、韵母系统。他又写了一系列研究上古音的著作，主要有《中日汉字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1923)、《诗经研究》(*Shi King Researches*, 1932)、《汉语词族》(*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1933)和后来的《汉文典》(*Grammata Se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1940)等。高本汉构拟中古音主要运用历史比较法，而构拟上古音则有两条主要途径，其一是从《诗经》押韵得到上古韵部系统（做法和他的中古音系相似，分部以清人成果为基础而有所更改）、从谐声字的谐声关系来研究上古的声母系统。其二是在构拟出的中古音基础上通过内部拟测法构拟上古音的音值。

高本汉的著作很快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赵元任、林语堂等首先向国内学术界作了介绍。1931年起，赵元任、罗常培开始翻译《中国音韵学研究》；次年由中研院史语所出面向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申请到经费，并有李方桂加入翻译。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还加了许多注释，并对原书作了不少补订，提高了它的质量，到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现代音韵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他的《汉语词族》由张世禄翻译成中文（1937年出版时书名为《汉语词类》）。还有些书没有经过翻译而就原文在国内影印。

高本汉的学说在他的书没有翻译成中文之前就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学者就他的方法和结论展开了讨论，一方面给以高度评价与肯定，又一方面提出一些批评和修改意见。他的方法被迅速推行开来，有较多的中国学者参加到古音构拟的工作中，以新的结论补充、改进汉语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拟音体系。引人注目的有林语堂、李方桂、钱玄同等人。林语堂的《古有复辅音说》、《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对上古声母的构拟有独到见解，《支脂之三部古读考》对高本汉所构拟的阴声韵浊塞音韵尾提出质疑。李方桂就韵母构拟跟高本汉展开了一场辩论。他的《切韵a的来源》（1931）、《东冬屋沃之上古音》（1932）、《论中国上古音的*-iwəŋ, *-iwək, *-iwəg》（1935）等文章，根据重韵关系分析出《切韵》音系以a为主要元音的韵来自上古时代以a和e为主要元音的两系韵部；他反对高本汉对一个韵部拟出几个不同元音的做法，认为同一韵部应构拟为同一个主要元音，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钱玄同的《古韵廿八部之假定》（1934）为黄侃的古韵二十八部构拟读音，用了较多的现代方音作证据，这就以实际行动否定了高本汉所说“现代方言对构拟上古音没有用处”的论点；每个韵部只构拟一个主要元音，阴声韵构拟成没有辅音韵尾的开音节。他的构拟体系是中国学者所构拟的第一个完整的上古音拟音

系统。

对于中古音的构拟，则有林语堂、罗常培、钱玄同、张世禄及苏联龙果夫（А. А. Дл парьков）等人在不同专题上各自发表了不同于高本汉的意见，为四十年代以后《切韵》音系的深入研究开辟了道路。

译音对勘方法的重要成就当推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一书的出版（1933）。该书用敦煌出土的几种汉藏对音材料及其他一些旁证，推溯唐五代西北方音的面貌，并同现代西北方音对比而考察该历史流变。

（三）文献音系和音类研究的深化

古音音值的构拟是现代音韵学的重要标志，但不是它的全部内容。现代音韵学还要继承传统的文献考据方法并加上新创造的一些方法，从丰富的文献中发掘古代语音的更多的证据，这同样是语言科学的组成部分。在二三十年代，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中国学者一般并不排斥传统方法中的主要精华，他们也以高度的热情和十分的努力去研究古音的类别。还有一些学者，仍然以传统方法为主进行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这一部分的研究内容相当广阔，简要归纳，可以分以下几个方面。

1. 对一向作为音韵学研究重点的上古音声母、韵部和《切韵》音系的声类、韵类作了更加深入细密的划分。

上古音研究较重要的成果当推王力“脂、微分部”学说的提出。王力在1936年发表《南北朝诗人用韵考》，1937年发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他从南北朝诗人用韵发现清人江有诰、王念孙所分“脂”部有分为两类的趋势，又从章炳麟、黄侃对“队”部的一部分收字举棋不定的情况受到启发，通过详细研究《诗经》用韵，认为脂部实应分为脂、微两部。他这一结论后来被普遍接受，成为定论。另外，在王力之前，曾运乾已经提出了这两部的划分

问题，但他的发现没有传播开，未产生影响。

曾运乾的《喻母古读考》是上古声母研究的力作，他认为上古不存在独立的喻母，但中古喻母字不是章、黄所说的那样归于影母，而是三等字属于匣母、四等字属于定母。这在学术界有过较大影响，不过后来人们对此有也颇多异议。

在《广韵》音类的研究方面，高本汉曾把《广韵》声母分出四十七个声类；曾运乾《切韵五声五十一纽考》分出五十一个声类；白涤洲《广韵声纽韵类之统计》运用了统计方法，考得《广韵》声类为四十七类、韵类为二百九十类。

2. 《切韵》音系以外的中古音考证

王力的《南北朝诗人用韵考》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里的南北朝四十九家诗人的用韵为对象，把南北朝诗歌韵部定为五十四部，并指出用韵的一些复杂关系。另有于安澜《汉魏六朝韵谱》收集了丰富材料。王越对上古支、脂、之、东、冬诸部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演变作了分析。

以反切系联法和反切比较法考察音义书、字书的声类、韵类，是这时期一个很大的收获。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声类考》和《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韵表》，从唐代慧琳和尚所编《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得声类三十六个、韵类一百七十三个，跟《切韵》音系出入甚大。此外有严学窘《大徐本说文反切音系》等。

白涤洲、黄侃、施则敬等人对《集韵》声类、韵类的研究，也有开先河之功。

3. 开始重视近代音的研究

近代音韵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也蔚然成风。钱玄同开始注意到《中原音韵》在普通话语音史中的地位，他的学生赵荫棠以极大的热心，投入很大的精力收集并研究近代音韵的韵书、等韵图。赵氏《中原音韵研究》一书称得上是北音学研究的奠基之作，该书不仅对周德清《中原音韵》的编纂背景、成书过程、历史意义作